

走出文革連載 12

走出文革

徘徊在生死之間

(接上一期)

扮演我的是一位矮個學生，另一個高個學生則在遠處放哨，以策安全。過了約定的時間，十七孔橋四周卻不見人影。此時天色漸暗，下起了毛毛細雨，兩人正想離開，祇見王榮芬手握報紙從遠處匆匆趕來。湖邊別無他人，她和冒牌的葉志江很快對上暗號。兩人沿着昆明湖邊走邊聊，王在三個小時的湖邊漫步中毫無顧忌地傾吐了她對文革的批判，並為彭真、蔣南翔等人鳴冤叫屈。王還解釋她第一次未能赴約，是因為紅衛兵抄她的家而無法脫身。

臨分手時，矮個學生突然說他不是葉志江，似乎想告以實情。但當王榮芬面露驚訝，責問他為什麼騙她時，他又立即謊稱他是葉志江派來的。

年僅十九歲的王榮芬哪裏能想到人世間的險惡，在頤和園門口，她還生怕這個自稱“葉志江派來的人”錯過了食堂開飯時間，特意去買了幾個麵包讓他帶回清華。幾十年中，我為她的單純和她的麵包惋惜不已。

這“一高一矮”兩個人回校後將王榮芬的“反動言行”整理成揭發材料，連同那幾個麵包一并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該校文革領導立即將王榮芬看管起來，準備批鬥。王乘人不備（又是一個乘人不備，可見文革時期的群眾專政漏洞百出），懷揣文革資料逃出學校。在喝了幾瓶敵敵畏後，她衝進外國駐華大使館。在被使館守衛攔下時，她已昏迷不醒。當她蘇醒後，

人們發現她已精神錯亂。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以外，又給她加了一項更加可怕的叛國投敵罪名。好在她對此已經無所謂了。

我從外地回校後，看到了這兩個學生整理的那份揭發材料。除了記述王榮芬的大量“反動言論”外，他們對冒名頂替的情節也寫得繪聲繪色，讓我印象深刻，過目不忘。

驚訝之餘，我深為王榮芬的遭遇惋惜，甚至覺得自己也是這一悲劇的肇事者。如果我不畏紅衛兵們的追殺留在學校的話，王榮芬也就不會有此遭遇。

在革命的大風浪中，人在生死之間的命運往往會因為一個偶然的因素而發生改變。當潔白的二校門在紅衛兵血洗清華園時轟然倒下後，紅色恐怖殃及的不僅僅是清華大學數百名教授、幹部和學生，連遠在魏公村的北外學生王榮芬居然也被它的餘波傷及。

1968(1967?)年的一天，清華冶金系(?)的一個女同學忽然來找我，問我是否認識王榮芬。我很驚訝，便告訴了她上面這個故事。她告訴我王是她的鄰居，出事後一直住在公安醫院。王的母親不久前和她說起她女兒口中一直在喊一個叫葉志江的人的名字，可能王發病和這個人有關。當她告訴王榮芬的母親葉志江是清華的學生後，王的母親便希望我能到醫院去見一見她的女兒，或許可以喚醒她女兒的記憶。

我答應了。但我後來沒有再見到冶金系的這位女同學，自然也沒有去醫院看過王榮芬。

我無法回憶起我未能去醫院見她的最終原因，我也不記得冶金系的那個女學生是如何同我失去聯系的。或許是王的母親改變了主意，也或許是後來我畢業離校了。我更懷疑當時我是否因為潛意識地認為王榮芬已成為叛國的反革命分子而害怕連累，而却步了。

此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過關於王榮芬日後命運的片字祇語。但幾十年中，我常為未能主動去尋找她們而內疚。

當黃肖路在網上追問我的人生經歷時，我寫下了上面這個故事。而她立即給我回了信：“我想你說的王榮芬就是我 EMAIL 給你的文章中的王容芬。我簡直不能相信你不知道她後來的下落！”

從她附寄的文章中，我才得知王榮芬，如果她和王容芬確是同一個人的話，在服毒自殺前給毛澤東發出了一封正氣浩然的信，要求尊敬的毛澤東主席“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王容芬因此被判了無期徒刑。她在獄中度過了近十年的鐵窗生涯和三年勞改歲月，遭受過非人的折磨。直到 1979 年，她才以反對四人幫的名義被宣布無罪，立即釋放。

出獄後的王容芬“如狼似虎讀史書，補功課，一把年紀出國覓師、寫論文，求索人類歷史上重大災難的理論根源……”終於成為著名的研究韋伯思想的專家，譯介了大量德文社會科學名著，包括馬克斯·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韋伯的《儒教與道教》，還寫出了《燧人氏》《庖犧氏》《有巢氏》等遠古史小說系列。

我十分駭異於黃肖路的回信和王容芬後來的遭遇。多年來縈回于腦際的疑問和內疚終於得到了釋放。我和黃肖路過去并不相識，但在我第一次接到她的電話時却感到了冥冥之中一種神秘的力量，讓我生出一種傾吐人生的悲歡離合的衝動。王容芬的出現似乎證實了我的這種預感。

但我將王容芬寫成我記憶中的“王榮芬”，我的兩位同學寫的揭發材料中用的便是這個名字。

人對細節的記憶有時是很無奈的，在我的記憶中或許還有其他的不確之處。

人到晚年重溫舊夢時，總是奢希望能解開人生旅途中那些不解之謎，能帶着無憾離開這個世界。我十分希望那個冶金系的女學生能見到我的這段回憶，能填補我記憶中的那些空白。

南京·東京連載 12

南京·東京(十)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劉洪友回憶說：“日本人的名字有長有短，還有平假名或片假名，印章的美觀，不光是臨刻上去的字要漂亮，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字構成的圖案要呈現出一種藝術美感。那時候我聚精會神地設計制作印章，完全到了忘我的地步，同宿捨人來來往往的脚步聲、睡覺

時的呼嚕聲我都感覺不到，全身心地投入刻印的創意中了。我就想，這是給日本書法家或者未來書法家用的印章，有的人可能會用一輩子，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上蓋上我刻的印章，也是對我作品的認可；要為他們的作品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不能成為人家作品中的敗筆，讓每個人的印章都有了自己的特

點。”

這一夜，劉洪友又是徹夜未眠，一張張設計稿攤鋪在地上，靈感持續被激發，欲罷不能。第二天天亮了，仍沒有一絲睡意。不用去拆地板，也不用去聽課，一整天他都在心無旁騖地研究和設計。他力求每枚印章從布局到字體都要和諧一致、精緻美觀。有時，會被一枚印章的設計絆住，苦思冥想，一會兒站起來走來走去，一會兒又伏案沉思；一旦來了靈感，抓緊落筆，就怕稍縱即逝。就這樣，他攻克了印章設計上一個個頑固的堡壘，經過二十四個小時的努力，終於完成了 108 枚印章的設計工作。

工作告一個段落，劉洪友鬆了一口氣，也才感覺到了勞累和饑餓。他吃了十幾塊巧克力，沉沉地睡到凌晨兩點才睜開眼，馬上起床開始動刀刻印。臺燈下，他全神貫注地盯着手中的印石，鋒利的刻刀在上面游走，刀與石的碰撞交流，發出動聽的聲音。他陶醉在這美妙的旋律中，以平均十分鐘刻好一枚印的速度向目標推進。到第二天晚上，108 枚印章全部刻制成功。

在將近兩天三夜的時間裏，劉洪友沒有時間外出，上趟廁所來回都要小跑。家裏備的點心、雞骨架等食物統統被他吃得精光。

五天後，豆子甲水之先生收到劉洪友寄來的沉甸甸的包裹。開始，他沒有想到是印章，當發現恰恰是一枚枚各具特色的精美印章時，他驚訝了。才幾

天時間，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 108 枚印章。這速度，這技藝，不能不讓人拍手叫絕。學生們拿到自己的印章，如獲至寶，個個愛不釋手，三三兩兩圍在一起交換印章，觀摩欣賞，都誇印章刻得好，誇老師有眼光。豆子甲水之心裏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對劉洪友刮目相看。

一周後，劉洪友手指磨破的地方結痂還沒有脫落，便收到豆子甲水之寄來的 87 萬日元。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錢，點錢的時候手都在瑟瑟發抖。當年中國的處級幹部月工資才相當於 1 萬日元，他僅三天就掙了一個處級幹部需要七年才能掙到的錢。拿到這一大筆錢，劉洪友欣喜若狂。他本來想，書法是自己的看家本領，結果一分錢沒掙到；而在國內一分錢沒掙過的篆刻技藝，到日本却幫自己掙了大錢。這才叫“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呢。

說起劉洪友學篆刻，起初純屬好玩在橡皮上刻，塗上紅墨水，往同學的胳膊上一蓋，深受調皮男生的喜歡。在家裏用土豆、蘿卜都練過手。上中專時在磚頭上刻，因為有書法功底，刻出來的印也有模有樣。後來在不同種類的石頭上雕刻，才真正算上刻印章了。工作後，他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尤其是田原和陳大羽的指點下，篆刻水平上了一個臺階。藝多不壓身，功到自然成。

後來，劉洪友在書法界和篆刻界已經有非常大的名氣了，但

他還是學無止境，繼續拜師學藝，博采眾家之長為己所用，提高自己的篆刻技藝。那是 2000 年左右的事，經朋友介紹，劉洪友幫上海著名的篆刻家韓天衡在日本舉辦了一期篆刻講座。

韓天衡先生是上海中國畫院副院長、一級美術師、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篆刻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文聯委員、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

他的金石篆刻拙中藏巧，動中寓靜，自然含蓄，充分體現了“雄、變、韻”的情致，風格自成一家，被稱作“韓派”，在當代印壇占有重要地位。國畫大師劉海粟、李可染、謝稚柳、程十發、黃胄、陸儼少等人的用印多出自韓天衡的手筆。他曾受中國政府的委托，為出席上海 APEC 會議的二十一國首腦刻印名章。所著《中國印學印表》一書獲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屆辭書評比獎。他與劉洪友在日本的富士山結為師徒，還賦詩一首，寫在一張清代的空白信箋紙上，贈予劉洪友。韓天衡的女兒在日本工作，每年他總會過來住些日子，劉洪友便借此機會登門拜訪求教。

劉洪友就是這樣虛心學習，不斷進步，刻印技術蒸蒸日上，手法和技藝爐火純青。

這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苦盡甘來成大志。耀眼的光環遲早會戴在那些不懼困難、勇于奮進的人頭上的。